

清代書目題跋選敘

——《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前言

沈乃文

提要：本文是2002年為《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所寫的前言，對叢書中收入的30種清代書目題跋，一一作了簡要介紹和評論。包括作者旨趣、成書原委得失、流傳過程，以及由於損毀、整理、增刪、傳抄、刻印等等原因而產生的不同版本等等，兼及藏書流傳史和目錄編撰史，是作者近年對清代書目題跋所作研究的成果之一。

關鍵詞：版本目錄學 書目題跋 古籍整理

要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需要讀中國的古書，也就需要瞭解有關古書的知識。比如古書內容的門類，歷代的重要著者和著作，某一部書的作者旨趣、成書原委、著述得失、流傳過程，以及在流傳中由於損毀、整理、增刪、傳抄、刻印等等原因，而產生出的不同版本，各版本之間的傳承和優劣，哪些版本比較稀見珍貴等等。這些知識在傳統學問中被稱為版本目錄學。

今天要瞭解和掌握版本目錄學，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充分地利用歷代的書目題跋。歷代的書目題跋，是古書的歷史檔案，包含着前人的研究成果。掌握和利用這一份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對於站在今天的高度，去閱讀、整理和研究古書，具有實際的意義。

清代以前的書目題跋，流傳至今的數量比較少，近年來已經影印出版得比較多了。清代至民國初年之間的書目題跋，數量比較多，質量也比較高，近年來有相當一些已經影印出版。但是未曾出版，而且比較重要，需求者往往不太容易找到，希望能夠盡早影印出版者，還有很多，其中包括以下諸書：

一、《絳雲樓書目》四卷 清錢謙益撰 清陳景雲注

清道光三十年（1850）南海伍崇曜刻《粵雅堂叢書》第九集本

二、《絳雲樓書目補遺》一卷 清錢謙益撰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湘潭葉德輝刻《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三、《述古堂藏書目》四卷 清錢曾撰

清道光三十年（1850）南海伍崇曜刻《粵雅堂叢書》第九集本

四、《述古堂宋版書目》一卷 清錢曾撰

清道光三十年（1850）南海伍崇曜刻《粵雅堂叢書》第九集本

- 五、《也是園藏書目》十卷 清錢曾撰
清宣統二年（1910）上虞羅振玉刻《玉簡齋叢書》二集本
- 六、《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一卷 清毛扆撰
清嘉慶五年（1800）吳縣黃丕烈刻《士禮居黃氏叢書》本
- 七、《季滄葦藏書目》一卷 清季振宜撰
清嘉慶十年（1805）吳縣黃丕烈刻《士禮居黃氏叢書》本
- 八、《傳是樓書目》四卷 清徐乾學撰
1915年仁和王存善鉛印《二徐書目》本
- 九、《傳是樓宋元本書目》一卷 清徐乾學撰
清光緒十一年（1885）儀徵吳丙湘犀守山莊刻《傳硯齋叢書》本
- 十、《培林堂書目》四卷 清徐秉義撰
1915年仁和王存善鉛印《二徐書目》本
- 十一、《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十一集 清沈初等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亶望浙江刻本
- 十二、《經籍跋文》一卷 清陳鱣撰
清道光十七年（1837）海昌蔣光煦刻《別下齋叢書》本
- 十三、《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 清孫星衍撰
清嘉慶十五年（1810）孫星衍刻本
- 十四、《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三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 清孫星衍撰
清道光二十年（1840）金陵陳宗彝刻《獨抱廬叢刻》本
- 十五、《廉石居藏書記》二卷 清孫星衍撰 清陳宗彝編
清道光二十年（1840）金陵陳宗彝刻《獨抱廬叢刻》本
- 十六、《曝書雜記》三卷 清錢泰吉撰
清同治七年（1868）杜文瀾蘇州刻本
- 十七、《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二卷 清莫友芝撰
清同治十二年（1873）獨山莫繩孫刻《影山草堂六種》本
- 十八、《持靜齋藏書紀要》二卷 清莫友芝撰
清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刻本
- 十九、《持靜齋書目》四卷續增一卷 清丁日昌撰
清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刻本
- 二十、《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四卷 楊保彝撰
1931年山東省立圖書館鉛印《山東省立圖書館叢刊》第二編本
- 二十一、《八千卷樓書目》二十卷 丁立中撰
1923年錢塘丁仁聚珍仿宋版印本
- 二十二、《觀古堂藏書目》四卷 葉德輝撰
1927年長沙葉啓倬葉啓慕鉛印本
- 二十三、《郎園讀書志》十六卷 葉德輝撰
1928年長沙葉啓發等上海淡園鉛印本

- 二十四、《群碧樓善本書錄》六卷 鄧邦述撰
1930 年江寧鄧邦述刻本
- 二十五、《寒瘦山房鬻存書目》七卷 鄧邦述撰
1930 年江寧鄧邦述刻本
- 二十六、《適園藏書志》十六卷 張鈞衡撰
1916 年南林張鈞衡家塾刻本
- 二十七、《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 莫伯驥撰
1936 年東莞莫培元等鉛印本
- 二十八、《經籍訪古志》六卷補遺一卷 日本森立之撰
清光緒十一年（1885）徐承祖鉛印本
- 二十九、《日本訪書志》十六卷 楊守敬撰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楊守敬鄰蘇園刻本
- 三十、《日本訪書志補》一卷 楊守敬撰 王重民輯
1930 年中華圖書館協會鉛印《中華圖書館協會叢書》第三種本

二

清朝初年的民間藏書是經過明朝末年改朝換代的劇烈社會動蕩之後的幸存者。當年兵火四起，民衆逃亡，富貴者自顧不暇，隨着戰後逐步安定，南北名家舊藏幾乎散亡殆盡。

劫餘人藏書於江南重新集中，其中規模較大的要數常熟的絳雲樓、述古堂和汲古閣，昆山的三徐，泰興的季振宜等名家。

絳雲樓主人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探花，詩古文詞冠絕當時，是文壇的領袖、東林的魁首。他的仕途屢起屢落，登鼎甲後入翰林院，即丁父憂，一下子閑置了十年。後來三次起復，都是不久即遭陷害，革職回籍。在家閑廢又是九年，仍遭陷害，被逮下京城刑部大獄。天下爲之不平，積成極高的清望。甲申之後，作了南明的禮部尚書，却諂事馬士英、阮大鍼。清兵抵近南京，更出城迎降，北上去作清朝的禮部右侍郎。進退失據，遂爲物議所不齒。旋即退隱回鄉，暗中反清，以求贖回名節；又兩次被清廷抓捕下獄，終老於家。身後著作至乾隆朝全遭查禁；是一位相當複雜的歷史人物。但是他自青年時，即以纂修《明史》自任，因而以善價廣收本鄉的趙琦美脉望館、楊儀萬卷樓，長洲的劉鳳厓載閣、吳縣的錢允治（錢穀之子），以及四方的藏書，留備採擇。曹溶曾云，每與其談及一書，他均能言舊刻若何，新版若何，中間差別幾處，驗之，纖悉不爽。可見謙益鑒書水準之高。當年海內文人學者履滿其門，他的好尚極大地影響了清初的一批藏書家。明崇禎十六年（1643）他將宋版孤本《漢書》、《後漢書》售予毛晉，籌資在虞山之東三十里建起絳雲樓。黃宗羲登樓感嘆，凡所欲見之書，無不在焉。時人譽絳雲樓爲江南藏書第一。令人至今痛心不已的，是清順治七年（1650）絳雲樓竟然失火，大部分藏書歸之一炬。舊時藏書爲避人覬覦、求借，例不外露。當年絳雲樓的書也是絕不外借的，更沒有聽說過曾經以

書目示人。傳說書燼之後，謙益在晚年依記憶作《絳雲樓書目》，以為前塵夢影。今天讀來，目中近三千種書的著錄頗嫌簡略，似清點簿冊。按曹溶的說法，他親眼見過的不少書尚不在其中，目中並缺少後來被裁作他用的明人別集。即便如此，雪泥鴻爪，三百年前的一代藏書之盛，端賴是目得以聊窺大體，其之可貴也就無需言喻了。

《絳雲樓書目》分七十三類，後有“補遺”，清末以前以抄本流傳。有趣的是，今傳的所有抄本之間，都不盡相同。類目不一，類目順序不一，各類收書多寡不一，書的排列順序也不一。有不分卷者，有依分類稱七十四卷者，也有依冊數稱為二卷或四卷者。同是四卷本，三、四兩卷的起迄也不一致。康熙年間，何焯的學生吳縣人陳景雲為是目作注，補充了卷數、作者、版本、流傳等許多內容，析為四卷，甚便讀者。乾隆三十八年（1773）吳翌鳳借得張思孝白華堂所藏的《絳雲樓書目》抄本，過錄了陳注，此過錄本後來流落於蘇州的坊肆，為廣東買辦富商伍崇曜購得。道光三十年（1850）崇曜以之為底本，將是目和陳注刻入《粵雅堂叢書》第九集，是《絳雲樓書目》的唯一刻本。可惜的是，崇曜所據的底本缺少最後的“補遺”。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葉德輝據郁松年宜稼堂和丁日昌持靜齋先後收藏的一個七十四卷抄本，將“補遺”刻入了《觀古堂書目叢刻》。今讀伍刻的四卷之後，接讀葉刻的“補遺”，《絳雲樓書目》的全貌即可瞭然。

述古堂主人錢曾（1629—1701）字遵王，號也是翁等，是錢謙益的族孫；入清不取仕進，從二十歲起，跟著謙益學詩、學文、學佛，也學藏書。謙益很稱讚他，謂其詩具靈心慧眼，玲瓏漏穿，本之胎性，出乎毫端，能紹自己之緒。今天看來，確也稱得上是清初以謙益為首的虞山詩派的代表作家。然而其詩文幾乎無聞於後世，藏書却使他青史留名。錢曾的居所，也是藏書處，稱述古堂，裏面有他父親錢裔肅的藏書，順治十八年（1661）又得到絳雲樓的焚餘書，再加大力收集，遂與汲古閣併成常熟一地在絳雲樓之後的兩個最大的藏書家。當年謙益過述古堂，撰“述古堂宋刻書跋”，謂堂中宋刻書“殆可當我絳雲樓之什三”，“吳兒窮眼，登汲古閣相顧愕眙，如入群玉之府；今得睹述古堂藏書，又復如何？”（《有學集》卷四六）可知述古堂的宋元善本收藏遜於絳雲樓，却勝於汲古閣。康熙五年（1666）錢曾在與季振宜商議刊行謙益的《錢注杜詩》時，將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與振宜。八年錢曾在毛扆的慫恿下，撰成《述古堂書目》十卷。道光三十年（1850）伍崇曜也將《述古堂書目》和錢曾所撰的《述古堂宋版書目》，收入《粵雅堂叢書》第九集，也是兩目的唯一刻本。錢曾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後居也是園，又撰《也是園書目》十卷，特點是第十卷廣收其他目錄中很少見的戲曲小說。宣統二年（1910）羅振玉刻《玉簡齋叢書》，將《也是園書目》收入第二集，為是目的唯一刻本。

《述古堂書目》與《也是園書目》也是長期靠抄本流傳。在不同的抄本中，同目之間內容參差不一。例如，前目的《粵雅堂叢書》本分為七十八類，而今存國家圖書館的述古堂抄本則分為九十四類，二者收書的多少顯然大有差別。後目的《玉簡齋叢書》本與今存的其他抄本相比較，收書也是多少互見。兩目之間的關係頗費思量。例如，前目的述古堂抄本比《粵雅堂叢書》本多出來的類目，基本上是後目的《玉簡齋叢書》本一百三十九類中的內容。在相應的類目之下，後目的《玉簡齋叢書》本所收書，也

較前目諸本增加不少。但是前目諸本中所收的書，又有若干為後目所無。今觀前目的述古堂抄本行文不避清諱，先後經過乾隆年間校勘過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汪中之子汪喜荀問禮堂，和民國初年傅增湘雙鑑樓收藏，當係錢曾訂本。後目有稿本，今存國家圖書館，也可信出於錢曾之手。既如此，兩目、諸本之間的差異，當是述古堂藏書時增時減，前目不斷增訂，最後形成後目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今將《述古堂書目》和《也是園書目》的刻本通讀，即可瞭解錢曾藏書的過程與全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述古堂書目》評價甚低，謂其“所列門類，瑣碎冗雜，全不師古，其分隸諸書，尤舛錯顛倒，不可名狀”。紀昀立論眼光獨到，古今欽佩。然而《述古堂書目》曾一再更改，至《也是園書目》，分類並非一成不變。如以《資治通鑑》入正史一類的疏誤，錢曾也自行改正了不少。譏以“曾號多見古書，而荒謬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微有過當。

汲古閣是毛晉（1599—1659）、毛扆（1640—1713）父子兩代的堂號。毛晉也是錢謙益的門生，初名鳳苞，字子久，晚更名晉，字子晉；早歲為諸生，屢試南闈不第，遂棄舉子業。毛扆是毛晉第五子，字斧季，不取功名，與錢曾友好，岳父為藏書家陸貽典。毛家固有田產，父子二人在與文人名士吟詠唱和的同時，以高價大規模購書，以至當時紛傳“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與毛氏”。毛家抄書超過 240 種，精美超群，為後代所珍視，稱為毛抄。買書、抄書不僅僅是為了收藏和轉賣，還用作編書和刻書的底本，印行銷售，獲取利潤。經營的規模甚大，刻書超過六百種，書版超過十萬片，創下了歷代書坊刻書的最高記錄。汲古閣藏書幾近百年，傳說逾八萬冊，使人遺憾的是沒有留下全部藏書的記錄，大概是買賣頻繁，變動無常所致。

毛晉於辭世前析產，藏書主要分給毛褒、毛表、毛扆三個兒子。褒、表兩家藏書較早流散。毛扆晚年亦家境困難，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四十七年（1708）間，為了將所藏善本售予潘來，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一卷，收書 800 餘種，分經史子集四部，各書之下都標有價錢。然而售書未果，部分書籍為時任江蘇巡撫的宋犖所得。嘉慶五年（1800）黃丕烈刻《士禮居黃氏叢書》，將是目收入，是最早的刻本。此後還有光緒十年（1884）朱記榮的校刻本。

述古堂和汲古閣衰落後，藏書向常熟周邊流散，善本書主要為北邊泰興的季振宜，和南邊昆山的徐乾學所得。

季振宜（1630—？）字詵兮，號滄葦，與錢曾和毛扆年齡相近，家族也是江南富室。父親季寓庸、哥哥季開生與他，分別是明天啓二年（1622）、清順治六年（1649）和四年的進士。兩代為官，兩代聚書。振宜先任蘭溪知縣，後任職刑部、戶部，再擢御史，最後在巡視河東鹽政任上乞歸。生平以作言官的名聲最高，人多以侍御稱之，《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也將其編入諫臣。然而他收購藏書的錢財，却傳說是斂自蘭溪和河東鹽政任上，狼籍聲名。在收入汲古閣、述古堂藏書之外，振宜還兼收其他，很快成為繼絳雲樓、述古堂、汲古閣而起的東南最大藏書家。不過他在乞歸之後未久即謝世，剛剛聚集起來的藏書也就隨之星散；相當多的善本輾轉歸入吳縣的黃丕烈士禮居和京師的怡王府收藏。

振宜有《季滄葦藏書目》一卷傳世，收書 1200 餘種，大量宋元珍本都賴是目留下踪跡，以致後世頗有讀錢曾《讀書敏求記》時，持是目與之對驗者。然而目似未定

稿，加上振宜鑒考欠精，傳抄又增魯魚，顯而易見的錯誤不在少數。黃丕烈在嘉慶十年（1805）將《季滄葦藏書目》刻入《士禮居黃氏叢書》，是流傳至今的較好版本，後來有光緒元年（1875）伍崇曜所刻的《粵雅堂叢書》第二十八集本。

昆山的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三兄弟，與季振宜同時，稱為昆山三徐，都是藏書的大家。乾學（1631—1694）字原一，號健庵，康熙九年（1670）探花，仕至刑部尚書；曾短期總裁《明史》，又曾編纂《大清一統志》；有傳是樓藏書，並撰有《傳是樓書目》。傳是樓寓意以書籍傳家，汪琬於《堯峰文鈔》卷二三之《傳是樓記》中形容，樓在乾學居所之後，凡七楹間，斫木為櫺七十有二，貯書若干萬卷，部居類彙，各以其次，素標細帙，啓鑰燦然。但是樓却於康熙中期不慎失火，傳說樓書皆為灰燼，令人惋惜。秉義（1633—1711）字彥和，號果亭，康熙十二年（1673）探花，因與哥哥、弟弟同朝為官，故自謙退，乞假歸里；乾學卒後召補原官，仕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有培林堂藏書，撰有《培林堂書目》，並留有名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求宋版，然宋版可以資校對。”元文（1643—1691）字公肅，號立齋，順治十六年（1659）狀元，仕至文華殿大學士；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監修《明史》十二年，卒於任上；有含經堂藏書，撰有《含經堂書目》。對於反映清初藏書來說，三部書目都很重要，但是迄今只有《傳是樓書目》和《培林堂書目》有刊本行世。

《傳是樓書目》的原稿僅剩集部殘本，今存上海圖書館。是目流傳，是一個主要由四個抄本演繹的故事，中心人物是嘉慶道光年間的劉喜海。喜海是諸城人，曾任汀州太守、浙江布政使，有嘉蔭榭、味經書屋藏書。《傳是樓書目》的第一、第二個抄本，皆缺明嘉靖以前的別集。第一個抄本在乾隆年間歸畢沅所有，後來轉贈孫馮翼，馮翼卒後流落於琉璃廠的萬卷堂書林，嘉慶二十三年（1818）為喜海所得。第二個抄本出查禮隱書樓，後歸謝三賓收藏，查、謝二人與乾學同時。此本內容依千字文排列，道光六年（1826）也為喜海所得，喜海用後本校勘了前本，咸豐二年（1852）喜海卒，經過校勘的前本散出，民國初年為王存善所獲。存善是杭州人，作過道員，晚年居上海。第三、第四個抄本內容較全，均依千字文排列。第三個抄本於道光七年（1827）藏於京師葉志詒平安館，又被喜海借得，與上兩本對勘，於道光八年抄出一個六卷的全本，今藏國家圖書館。第四個抄本是道光年間浙江海鹽人馬玉堂漢唐齋所抄，民國初年為張元濟涉園收藏，可惜書的首尾已經殘損。王存善從涉園借得此本，用以補充喜海校勘過的第一個抄本。具體地說，是將明嘉靖以前的別集補於集部之後，並補充了史部和子部，而經部和總集類則依舊，於1915年鉛印發行，是《傳是樓書目》唯一的刊行本。常見此本的著錄有四卷、四卷附一卷、五卷的不同，即是對於補充部分的敘述不同所致。需要指出的是，存善鉛印本缺少地方志，各類內容與國圖藏喜海校抄本之間亦略有出入。另外，存善所得的喜海校勘本，和借用的第四個抄本，應該都是依千字文排序，每部書的書名著錄於上，作者著錄於下，貼近乾學插架目錄的原貌。然而存善鉛印本僅依四部分類排列，無千字文次序，每部書先記錄作者，再連續記錄書名，似乎是自行更改兩個底本的體例而成。存善在修改時，對於清初的許多書籍已經感到陌生，以至鉛印本中的錯字、漏字、衍字頗多；還為節省篇幅，而刪掉了多數的復本。這些都是閱讀時需要注意的。

《傳是樓宋元本書目》傳出徐乾學手，唯一的刻本是光緒十一年（1885）吳丙湘屠守山莊所刻的《傳硯齋叢書》本。丙湘底本假自乾學後人徐衡，但不是其家藏的稿本，而是衡父借劉喜海抄本再抄的本子。國家圖書館今藏一喜海抄本，依千字文排列，係喜海於道光七年借杭州汪遠孫振綺堂藏本轉抄者，當即衡父再抄之底本。是目中頗有僞本，已經顧維嶽檢出 13 種。維嶽，蘇州藏書家，嘗與曹溶、何焯、朱彝尊、陸澐往來，相互借抄藏書。

《培林堂書目》收書 3000 余種，數量很大，然而兩百多年來未為世重。今天看來，是目中著錄的若干明末、南明史書，以及各類中相當一些明清書籍，均為清初他目所無，是非常值得重視的。是目由於名聲不高，傳抄本也遠不及《傳是樓書目》多，且均不分卷。1914 年前，王存善得到一個抄本，念是目世鮮傳本，遂分為四卷，次年與《傳是樓書目》一併鉛印為《二徐書目》，是《培林堂書目》的通行本。

三

清代中期有關書籍收藏、整理的最大舉措，是乾隆年間纂修《欽定四庫全書》。三十七年（1772）正月乾隆帝下詔徵求遺書，由各省督撫學政操辦。至三十九年（1774）夏，進書最多的是浙江，凡十二次，共計 4522 種。其中包括吳玉墀（吳焯瓶花齋）、汪啓淑開萬樓、孫仰曾（孫宗濂壽松堂）、鮑士恭（鮑廷博知不足齋）、汪汝璥（汪憲振綺堂）、范懋柱（范氏天一閣）、鄭大節（鄭性二老閣）等名家的藏書。當時的作法，是將所徵書籍除還重複，詳檢每書卷帙爵里，摘叙著述大指，並志刊刻歲月，敘目以進。操作中，原始的撰稿比較詳細，而進書目錄的條文比較簡略。三十九年（1774）徵進書事完成，地方官遂以備一方掌故的名義，將原始的撰稿按四庫次序彙編成《浙江採進遺書總錄》，當年頗有影響，仿行者有彭啓豐等編纂的《江蘇採進遺書總錄》等等。

《浙江採進遺書總錄》共十一集，最後一集是閩集，編纂總裁是浙江平湖人沈初。沈初（？—1799）字景初，號雲椒，乾隆二十八年（1763）榜眼。在乾隆朝仕至吏部左侍郎，曾充四庫全書館和三通館的副總裁，長年值南書房。至嘉慶朝以暮年入軍機，遷兵部、吏部、戶部尚書，充實錄館副總裁，卒於官。沈初當時任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講、日講起居注官，正好因丁祖母承重憂在家，遂為地方官所延致，總成其事。是目撰寫和成書都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之前，因具參考價值，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在浙江刊刻發行。由於僅此一刻，今天已不多見。

雖然清廷在纂修《欽定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寓禁於徵，手段嚴酷；但是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訪書，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達到的較高水平，促進了民間藏書的發展和版本目錄的研究，在太平天國起事之前，形成了一個比較興盛的時期。當時曾經編撰書目題跋著作的一批藏書家當中，有陳鱣、孫星衍和錢泰吉。

陳鱣（1753—1819）字仲魚，號簡莊，浙江海寧人，嘉慶三年（1798）舉人，長於小學，勤於著述，曾經會試不第，遂以聚書著作終老。他的向山閣藏書，達十餘萬卷。當年他每得善本，即與本鄉另一位藏書大家，號稱“千元十架”的拜經樓主人吳

騫，和吳縣的藏書大家，號稱“百宋一廬”的士禮居主人黃丕烈互相傳觀，並手自校勘，數十年如一日。在此過程中，他將各本的異同、版刻的源流、文字的譌謬，逐一辨正發覆，寫成題跋 19 篇，匯為《經籍跋文》一書。

《經籍跋文》僅一卷，篇幅不長，但頗受後世考文獻者重視。第一個刻本是道光十七年（1837）海昌蔣光煦刻的《別下齋叢書》本，後來又有光緒初年章壽康刻的《式訓堂叢書》初集本、光緒四年（1878）成都葉氏龍眠山房刻本，和光緒七年（1881）歸安姚慰祖於粵東藩署刻的《晉石厂叢書》本。

孫星衍（1753—1818）字淵如，號伯淵，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是一位官吏兼學者的人物。平生致力於經學和小學，旁及諸子、金石、書畫，著述頗豐。星衍於乾隆年在京任翰林院編修、三通館校理、刑部郎中的時候，即開始聚書，傳說借抄善本，幾無虛日。六十年（1795）携書去山東，任兗沂曹濟道。嘉慶元年（1796）權按察使。四年丁母憂携書回籍，在陽湖遇風覆舟，數十簞書皆沉濕，損失大半。五年在家自編“孫氏藏書目”。六年應阮元聘請，主持詁經精舍，繼續購書。十年補授了山東督糧道，又將藏書精華運至任所，更以重值遠購善本及四庫未收書，收藏又具規模。十二年署布政司印，編珍善本書目為《平津館鑒藏書籍記》。次年乞假至江寧修建家祠，為了避免以前的藏書家率閱數十年一二世書即散佚的結局，宣布將藏書置於家祠，不為己有，並重編“孫氏藏書目”，改題為《孫氏祠堂書目》。十六年引疾歸，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兩年後卒。身後藏書先由兩子分藏於蘇州和金陵，後來善本悉為狡獪之徒多方賺去，其中一部分歸入了湘潭袁芳瑛的卧雪廬。星衍希望藏書能够世守永傳的苦心和企盼，終成泡影。

《孫氏祠堂書目》收書 2100 百餘種，為教導族內子弟讀書，編歷代書籍之精要者為內編四卷，編其餘為外編三卷。當代對是目評價頗高，認為它所分的十二大類，敢於突破《欽定四庫全書》的四部分類體系。但就星衍來說，或許只是考慮子弟學習的便利，將傳統學問按十二個月分排而已。是目現有稿本存北京大學圖書館，題名《孫氏金陵忠愍侯祠堂書目》，寫成於嘉慶十二年（1807）之後。《孫氏祠堂書目》最早的刻本，是嘉慶十五年星衍自刻本，後來有光緒九年（1883）李盛鐸刻的《木犀軒叢書》本。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集中了星衍藏書的精華，多有四庫未收書。星衍自序說，是“擬以善本及難得本，匯請名大府進御存”的，前三卷為“洪明經頤煊助余寫錄成帙”。羅振常先生於 1916 年前曾見是目稿本，說是抄字眉批全出洪手，間有星衍手書。頤煊（1765—1833）字旌賢，號筠軒，浙江臨海人，嘉慶六年（1801）舉人，曾官廣東新會知縣，著作等身，有小停雲山館、蘭雪軒藏書四萬卷，當時館於星衍家。星衍歸里後，編檢家藏舊版書，又成補遺一卷和續編一卷；但未及刊刻是目。至道光十六年（1836），金陵人陳宗彝從星衍之子孫竹床處借得稿本，於二十年刻入了《獨抱廬叢刻》。此後又有光緒初年章壽康所刻的《式訓堂叢書》二集本，和光緒十一年（1885）李盛鐸刻的《木犀軒叢書》本。

《廉石居藏書記》是星衍身後遺留的未完稿，內容在《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之外，有書名而無類次。道光十六年（1836）陳宗彝也於孫竹床處得之，依《孫氏祠堂書目》

分內外編之例，將文稿編爲二卷，也於二十年刻入了《獨抱廬叢刻》。後來也有光緒初年章壽康所刻的《式訓堂叢書》二集本，和光緒十一年（1885）李盛鐸刻的《木犀軒叢書》本。

錢泰吉（1791—1863）字輔宜，號警石，浙江海鹽甘泉鄉人，是錢儀吉的弟弟；道光七年（1827）官海寧州訓導時，將家藏書萬餘卷携至學舍，自鈐印章曰“官冷身閑可讀書齋”，讀書校書至終老不輟。泰吉將隨筆記錄的考校心得，在道光年間彙編爲《曝書雜記》，另有若干題跋散在《甘泉鄉人稿》和《餘稿》之中。

《曝書雜記》有二卷本與三卷本之別。道光十八年（1838）最初成書時只有二卷，次年蔣光煦刻入了《別下齋叢書》，兩卷本自此通行。道光末年泰吉又有新作，因而在咸豐四年（1854）刊行自己的詩文集《甘泉鄉人稿》二十四卷時，將《曝書雜記》擴充爲三卷，作爲集中的卷七至卷九，是爲三卷本之祖。不幸的是，咸豐十年《甘泉鄉人稿》的全部書版毀於兵火，印本遂亦無存。同治二年（1863）泰吉卒，五年後他的門人杜文瀾在蘇州重刻了《曝書雜記》三卷，大題仍標“甘泉鄉人稿”，是今天所見的三卷本中最早的本子。同治十年（1871）泰吉的次子錢應溥重刊《甘泉鄉人稿》，將文瀾所刻的《曝書雜記》三卷印入其中。但是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泰吉之孫錢志澄認爲文瀾所刻，與應溥所刻形式上不一致，重新再刻《曝書雜記》三卷。文瀾所刻遂被撤出單行，大題被挖改爲《曝書雜記》，此乃單行的文瀾刻本卷端有兩個書名自相重複的原因。光緒初年章壽康翻刻了文瀾刻本，收入《式訓堂叢書》初集。

四

晚清時節，民間藏書受到太平天國戰爭的重大影響。從咸豐元年（1851）至同治三年（1864）的十四年間，太平軍橫掃半個中國，徹底動搖了清朝的統治。同時，頻仍的戰火也使大量的民間藏書化爲灰燼。當時舊家名藏或毀或散，有權勢者乘機掠奪，有實力的小藏書家也借勢收購，幸存的書籍因而重新集中，形成了清朝末年一批藏書規模在十萬卷以上的新藏書家。先有丁日昌的持靜齋，與江蘇常熟瞿鏞的鐵琴銅劍樓、浙江吳興陸心源的皕宋樓，在江南鼎足而三。後來持靜齋敗落，山東聊城楊以增、楊紹和父子的海源閣，和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樓興起；形成盛名一時的海內四大藏書家。

莫友芝（1811—1871）是清末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也是詩人和金石家，字子偲，號邵亭，貴州獨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舉人，曾入曾國藩幕府，主持江南官書局。有影山草堂藏書，可惜盡毀於咸豐五年（1855）。他先後撰有《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和《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重記錄諸書版本。兩目在成書後的一百年間，曾經是版本鑒別方面的重要秘笈。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寫於同治四年（1865）至八年間，是友芝檢閱浙江故家流散出的宋金元明刻本抄本書時，對其中130種書所作的記錄，由次子莫繩孫整理編輯成書。附錄有“書衣筆識”一卷，和“金石筆識”一卷。是目今有稿本兩種，均存國家圖書館。第一個刻本爲同治十二年（1873）的莫繩孫刻本，收入《影山草堂六

種》。後來有光緒十年（1884）的上海還讀樓刻本。

丁日昌（1822—1882）字雨生，號持靜，廣東豐順人，歷官瓊州府學訓導，萬安知縣，蘇松太道，兩淮鹽運使，江蘇、福建巡撫。按莫友芝的說法，日昌於咸豐九年（1859）任萬安縣令時，即開始收書。藏書處先有實事求是齋、百蘭山館、讀五千卷室，在同治年後為持靜齋，不算複本，藏書可十萬卷。其中宋元校抄本居十之三四，堪稱富甲一方。藏書中引人注目的是上海郁松年宜稼堂、蘇州顧沅藝海樓，以及黃丕烈百宋一廬、汪士鐘藝芸精舍等名家藏書，都是其任職於上海、蘇州、江蘇時，乘太平軍戰後，名家藏書流散的機會斂進的。有關他乘人之危巧取豪奪的傳說頗多，故其雖於政治、經濟、軍事、實業、洋務外交等項，均有能名，但於藏書一項，則多有言其取之非其道者。日昌藏書有《持靜齋書目》和《持靜齋藏書紀要》二種目錄。光緒十二年（1886）江標嫌《持靜齋書目》蕪雜，精選其中500餘種，編成《持靜齋宋元校抄各本書目》一卷，刻入了《江刻書目三種》，是兩目之外的一個刪選重編本。

《持靜齋書目》四卷續增一卷，共收書3800百餘種。不僅記不同版本，還記收藏印章。卷端題“豐順丁氏輯”。日昌藏書先有《百蘭山館藏書目錄》，傳出林達泉手，今謂已佚。然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持靜齋書目》稿本，版心上即印“百蘭山館”四字，則《百蘭山館藏書目錄》當為《持靜齋書目》前身，已化入《持靜齋書目》之中。《持靜齋書目》最早的刻本是同治間日昌自刻本，書版保存流傳時間甚長，直至1934年售給了北平的來薰閣書店後，書店又印售了若干部，今存頗多。葉昌熾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為《持靜齋書目》所作的序言，見《奇觚廬文集》卷上，謂當時日昌之子丁叔雅賣書走都下，藏書尚無恙，則持靜齋的主要藏書當在1934年前流散於北平。此外，《持靜齋書目》還有1918年廣州華英書局的刊行本。

《持靜齋藏書紀要》二卷，莫友芝撰，是友芝於同治六年（1867）秋，應剛任江蘇布政使的丁日昌邀請，檢選持靜齋藏書中的稀見傳本560餘種編成的。有謂日昌《持靜齋書目》條文乃刪略友芝是目而成。今檢《持靜齋書目》稿本，則先是友芝“紀要”在頗多條文中摘錄了日昌“書目”原稿的一些文字，另作發揮。其後日昌又參考友芝“紀要”修訂了“書目”，不少論述確實體現了他的水平，同時也有將友芝鑒定過的版本錯改之處。《持靜齋藏書紀要》的刻本，有與上目相同的同治間日昌自刻本、來薰閣刷印本，和1918年華英書局刊行本；另外還有1924年蘇州文學山房的木活字印本。

楊以增（1787—1856）字益之、至堂，道光二年（1822）進士，歷任貴州荔波、貴築知縣，貴陽知府，甘肅按察使，陝西布政使，江南河道總督兼漕運總督，卒於官。以增收書始於道光年間，太平天國興起時，正在河督任上，因收得汪士鐘藝芸書舍之書，其中多有士禮居善本。以增次子楊紹和（1830—1875）字彥和、總卿，同治四年（1865）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卒於官。祺祥之變時，紹和正在京師，因收得端華樂善堂之書，其中多有傳是樓和季振宜的舊藏。楊家更廣收彭元瑞知聖道齋、鮑廷博知不足齋、惠士奇惠棟父子紅豆山房、秦恩復石研齋、劉喜海味經書屋藏書，洵成一時之盛。楊家藏書處稱海源閣，今天統計，當年全部藏書達3600餘種、170000卷之多。咸豐十一年（1861）捻軍進出山東，海源閣藏書受損，後又有所補充。紹和撰有《楹書隅錄》初續編，僅及268種。光緒末年紹

和之子楊保彝（1852—1910）將時存書籍編為《海源閣書目》和《宋元本書目》二種，報送官府備案。《海源閣書目》收書 3236 部，多為明清本，未得刊行；得到刊行的是《宋元本書目》。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即《宋元本書目》，收宋元校抄本 464 部。《楹書隅錄》記載，以增曾將天水舊籍別辟宋存書室收藏。紹和曾編《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收書 397 種，自抄本今藏國家圖書館。保彝編《宋元本書目》即以《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為底本，增加 69 種，刪去兩種，並對版本作了若干訂正。1931 年王獻唐輾轉購得保彝當年的清抄稿本，分為四卷，並改名為《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由山東省立圖書館鉛印出版，並編入《山東省立圖書館叢刊》的第二編。

丁丙（1832—1899）字嘉魚，號松生、松存，浙江錢塘人。丁氏乃藏書世家，祖父丁國典、父親丁英均藏書。丙與其兄丁申（？—1888，字竹舟）均不事科舉，以鄉紳自處，一意發展藏書，藏書處有八千卷樓、後八千卷樓和小八千卷樓。咸豐十一年太平軍破杭州，文瀾閣樓、書並毀，丁氏兄弟致力搶救，又於光緒年間千方百計地抄補缺殘，使之大體恢復了原貌，一時傳譽海內。光緒十四年（1888）丁丙之子丁立中撰《八千卷樓書目》二十卷，收書 15000 餘種。二十一年丁丙撰《善本書室藏書書志》四十卷，收書 2300 餘種。後目主要記錄小八千卷樓的善本，而前目則基本上是丁氏藏書的總目。

《八千卷樓書目》稿本今藏南京圖書館。丁氏藏書不重宋元本，以明清人著作、浙江人著作和戲曲書籍為多，唯一的刊本是 1923 年錢塘丁仁聚珍仿宋版印本。

五

辛亥革命後，以四大藏書家為代表的清末一代藏書衰落，民國新人代興。在名列前茅的藏書家中，楊守敬、葉德輝、鄧邦述、張鈞衡、莫伯驥等，均撰有書目行世。

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號直山、郎園，湖南湘潭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曾任吏部主事，不久辭歸。他的舊學頗好，但是對於清末的新政、變法，和後來的辛亥革命、農民運動，都極力反對，終致喪生。德輝收書甚早，中舉之後即在家鄉收入袁芳瑛卧雪廬的藏書，又至都門廠肆，收得宋犖緯簫草堂、孔繼涵紅欄書屋的藏書，持續收書四十年。藏書處稱觀古堂，積累藏書逾二十萬卷。1911 年前藏書的總目錄是《觀古堂藏書目》，1926 年前題跋的總集是《郎園讀書志》。

《觀古堂藏書目》四卷，收書 5100 餘種，初編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修訂於 1911 年。稿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1916 年德輝兩子葉啓倬、葉啓慕將是目鉛印發行。

《郎園讀書志》初名《郎園藏書題跋記》。德輝年輕時即存續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之志，故每得一書，必於餘幅筆記數語，以為他日之藍本。1916 年後次第抄出，命從子葉啓崑詮為四卷，自謂可以補正張之洞《書目答問》之缺誤，亦足備《清史藝文志》之取材。1918 年後又有新作，遂於 1926 年重新分為十六卷，並改“題跋記”為“讀書志”。德輝卒後，藏書散亡，從子葉啓勳、葉啓發携此書手稿至上海，次年在上

海鉛印發行。

鄧邦述（1868—1939）字孝先，號正閭，江蘇江寧人。是與林則徐一同在虎門銷烟的兩廣總督鄧廷楨的孫子，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二十七年入端方幕府，籌辦江南圖書館。三十一年隨端考察歐美憲政。三十三年後任吉林交涉司使、民政司使。辛亥乞歸，民國初年短期任東三省鹽運使、清史館纂修、江蘇省參議員。邦述先受其外舅、曾國藩幕僚趙烈文天放樓藏書的啓迪，後受端方匋齋藏書的影響，從光緒三十年開始收書，藏書處稱群碧樓，聞名海內。宣統三年（1911）編《群碧樓書目初編》九卷，附“書衣雜識”一卷，排版印行。辛亥革命後，從東北遷到天津，生活困難，遂將數部宋本售予袁克文。1921年移家吳郡，生計無著，至1927年將所藏善本售予中央研究院，並將這一部分編成《群碧樓善本書錄》，將剩餘書籍編為《寒瘦山房鬻存書目》。邦述卒後，餘書1100種輾轉為中央圖書館所得。

《群碧樓善本書錄》六卷，收書430餘種。《寒瘦山房鬻存書目》七卷，收書380餘種。兩目合計，共820餘種；均於1930年由邦述在寧自行鉛印發行。今天鄧氏藏書的絕大部分在臺灣，兩目可資查詢彼處藏書。惟兩目的版本鑒定略有舛誤，需要留意。

張鈞衡（1872—1927）字石銘，號適園主人，浙江湖州人，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曾任兵部車駕司郎中。1907年在南潯修建適園，中有六宜閣藏書。1911年後居上海，廣收善本，特別重視抄本，藏書達十萬餘卷，遂與同鄉的蔣汝藻密韻樓、劉承幹嘉業堂齊名。1916年編成《適園藏書志》。鈞衡卒後，其子張乃熊，字茝圃，繼續聚書，至1941年難以為繼，遂編《茝圃善本書目》備售，藏書後為中央圖書館收購。

《適園藏書志》十六卷，署名“吳興張鈞衡石銘”，繆荃孫序云：“荃孫商榷宗旨，督率寫官，辛苦兩年，告成志幸。”則主持為鈞衡，任事乃荃孫也。1916年鈞衡以家塾名義刊刻行世。由於適園藏書是今天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的主要組成部分，所以是目為瞭解彼館藏書的重要參考之一。

莫伯驥（1878—1958）字天一，廣東東莞人，曾經學醫賣藥，編輯報紙，抗戰後遷居香港，卒於澳門。伯驥自述藏書自1925年始，陸續收入盛昱意園、臨清徐坊、揭陽丁日昌持靜齋、南陽孔廣陶嶽雪樓、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館、江陰繆荃孫藝風堂、茂苑蔣鳳藻十印齋、長沙葉德輝觀古堂、獨山莫棠銅井文房、揚州吳引孫測海樓、聊城楊氏海源閣等衆多名家的流散藏書，甚至有天祿琳琅的遺珍、《永樂大典》的零本。藏書處命名為五十萬卷樓，足見其收藏規模之巨。抗戰中伯驥避居香港，五十萬卷藏書毀於廣東，令人扼腕。藏書目錄有《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和《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二十二卷，收錄善本900餘種。1936年編成，由莫培元等鉛印行世。據說伯驥後有“續編”、“再續編”之作，均未能刊行。1948年伯驥將《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刪削重定為《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收書400餘部，兩目可比照參看。

六

在中國與東鄰日本漫長的文化交流中，書籍的交流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古書曾

經大量地流入日本，使得日本成為海外收藏中國古書最多的國家。清朝末年，日本藏書家所編的目錄，首舉森立之撰寫的《經籍訪古志》；而中國學人至日本訪書所編的目錄，則首舉楊守敬撰寫的《日本訪書志》。

森立之（1805—1844）字立夫，號枳園，是醫生和漢籍收藏家。日本漢學家狩谷掖齋曾經舉辦參加者携自藏貴重古書前來，彼此互相鑒賞的聚會。掖齋卒後，丹波元堅在別宅中繼續舉辦這種古書鑒賞會，並要求森立之以掖齋當年的記錄為基礎，加以補充，編成是目。光緒年間楊守敬在日本訪書，曾持是目按圖索驥。日本版本目錄學家長澤規矩也先生在《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中，有關於是目的簡介。

《經籍訪古志》六卷補遺一卷，手稿於1935年由東京日本書志學會影印出版。光緒十一年（1885）徐承祖、姚文棟在日本排版，並經過森立之親自審校和補充，鉛印發行。此鉛印本內容較影印手稿本多，是最好的版本。後來有上海廣益書局1916年的排印本。

楊守敬（1839—1815）字惺吾，號鄰蘇，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1862）舉人，曾任黃州儒學教授。光緒六至十年為駐日公使隨員，在日本廣搜古書。回國後執兩湖書院講席，民國後為參政院參政。守敬是清末著名學者和藏書家，有觀海堂藏書，並撰有《日本訪書志》。守敬卒後，觀海堂藏書歸故宮博物院，1927至1930年間，王重民先生從藏書中將不見於《日本訪書志》的題跋檢出，輯為《日本訪書志補》。

《日本訪書志》記錄守敬在日所見所得的古書，共230餘種，今有稿本兩種藏重慶市圖書館。光緒二十三年（1897）鄰蘇園自刻本是《日本訪書志》唯一的刻本，但是有十七卷本與十六卷本的不同。守敬當年隨筆記錄檢書所得，後來整理彙編為是目。刻本冠有自撰的“《日本訪書志》緣起”，寫於光緒七年（1881），應該就是彙編之始。守敬初刻時是理好一篇刻一篇，因而分類和葉碼的編排都有混亂之處，卷十七僅有“古鈔王子安文”一篇十一葉。大概是自己也不滿意，因而在書刊行以後，守敬又重加編排，刪去卷一的“古文尚書志”一篇，又將卷十七的“古鈔王子安文”一篇改為卷十六的附錄，將全書定為十六卷，挖改重印。十六卷本冠有守敬手書自序，寫於光緒二十七年，當是重編完成的時間。

《日本訪書志補》一卷，共46條，1930年由中華圖書館協會鉛印出版，並編入《中華圖書館協會叢書》，作為叢書的第三種。

七

上述書目題跋對於瞭解清代前、中、後期的實存書籍，都是非常有用的。應該指出，以上30種書目題跋並非一類，例如，《絳雲樓書目》、《述古堂藏書目》是登記式書目，《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平津館鑒藏書籍記》是解題式書目，《經籍跋文》、《曝書雜記》則是題跋式書目，不同類型的目錄有着不同的特點。上述書目題跋的內容也是各有得失，諸如著錄的詳簡、版本鑒定的真偽、見解議論的高低、分類排序的恰當與否等等，都很有一些說道。前人曾經作過的很多分析，今天也值得總結。這些均因篇幅所限，不予贅述。

上述扼要介紹各書目題跋的藏書家概況、藏書淵源、編目原委，以及版本的流變，謹供需求者在購買、閱讀、使用《海王村古籍書目題跋叢書》時參考。誤謬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2002 年 7 月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圖書館）